

五四思潮与五四人物研究

史云波 董德福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五四思潮与五四人物研究

史云波 董德福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思潮与五四人物研究 / 史云波, 董德福著.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84-0134-0

I. ①五… II. ①史… ②董… III. ①五四运动—社会思潮—研究②五四运动—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IV.
①D092.6②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965 号

五四思潮与五四人物研究

Wusi Sichao yu Wusi Renwu Yanjiu

著 者/史云波 董德福

责任编辑/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8.6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134-0

定 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 0511-84440882)

自序

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政治爱国运动，前者为后者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后者不断将前者推向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出版为标志，迄今整整一百年。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群星灿烂，各种思潮竞相登台亮相，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从思想史的维度观察百年中国，必须聚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想主潮之间的互斥互融，这三大思想主潮均以五四为滥觞，伴随着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转进而发生着符合各自内在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演变。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①另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以《新青年》为中心而展开的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要出现‘五四’‘六三’那样规模宏伟、永载史册的爱国运动，是不可想象的。”^②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也就不可能形成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不可能出现彻底清算传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页。

②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统文化的冲动;如果没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向传统的宣战,也就不可能产生以现代新儒家和学衡派为代表的坚守儒学本位的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者主张渐进式的改良,即用西方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谋求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保守主义者反对西学独断,主张返回儒家价值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试图以反潮流的方式导正社会发展的航向;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当代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也肇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正因为如此,一百年来,中外政学两界对五四的研究热情不因时代的演进而减退,五四研究几成显学。五四思潮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性,国共两党均注重从五四遗产中寻找精神资源,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从思想文艺向政治运动的转向表示担忧,梁漱溟、吴宓、梁启超等保守主义者以批判五四现代性的方式追寻另一种现代性。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在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研究者那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五四实有不堪重负之叹。

对五四研究的反思,是五四研究深入开展的必要前提。通过对国共两党、新启蒙学者张申府、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以及港台和海外学者罗家伦、杜威、罗素等人五四观的研究,可以窥见不同时代五四精神的沉浮。梁启超、梁漱溟、吴宓、朱谦之、胡适等是五四时期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诠释着五四精神。虽然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五四精神仍然具有时代价值,继承、弘扬、超越五四精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共历代领袖在每年的5月4日都要发表纪念五四的讲话,学术界也有规模不等的纪念五四的活动,这本身已形成新的传统。可以说,不懂得五四,就不懂得现代中国;不注意从五四遗产中汲取智慧,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就失去了一大精神资源。

目 录

自 序 001

第一章 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精神传承 001

第一节 五四运动研究三题——从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谈起 002

一、复杂性：关于五四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002

二、歧向性：关于五四诠释的模式问题 005

三、时代性：关于五四遗产的价值问题 009

第二节 回归五四现场——五四时人对“五四”的批评、辩护和反思 013

一、五四时人对五四缺点的批评 015

二、“新青年”领袖对时人批评的即时辩护 024

三、“新青年”领袖对五四缺点的反思 027

第三节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以张申府为中心 035

一、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与落幕 036

二、新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旨在抗日救亡的新文化运动 041

三、新启蒙运动“超越”五四了吗？ 047

四、新启蒙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052

第四节 五四创造精神与当代青年的责任和使命 056

一、创造是五四精神的实质 056

二、五四创造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060

第二章 港台及海外学者五四观研究 065

第一节 罗家伦的五四观及其历史演变 066

一、对五四运动最早的理性反思 067

二、讴歌五四的政治意义以服务于抗日救国 069

三、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与党派意识的屏障 071

第二节 杜威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及指导 075

一、难舍的五四情结 075

二、感情与理性相配合的渐进论 078

三、反固执、反盲从的中西文化折衷论 084

第三节 杜威中国之行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 089

一、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反响 089

二、杜威的演讲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影响 093

第四节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阐释及其转进 101

一、“五四之子”：殷海光的自我思想定位 101

二、中年殷海光：沟通五四和青年一代的精神
桥梁 105

三、晚年殷海光：有限度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110

四、晚年殷海光五四阐释转进的启示 116

第五节 罗素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观辨正——以《中国问题》为中心 120

一、中国问题的系统化观察 122

二、通过“中国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前途号脉 125

三、罗素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出路的误诊 130

第三章 五四保守主义思潮与人物 133

第一节 梁漱溟“文化三路向”的当代解读 134

- 一、“文化三路向”概述 135
- 二、以发挥孔子人生哲学为己任 142
- 三、回归传统以重建新文化 145

第二节 梁漱溟新儒学思想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贡献 149

- 一、最后的儒家：特立独行梁漱溟 149
- 二、复兴儒学以抗衡西化 152
- 三、以人文自觉反对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
误导 155
- 四、开启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 157

第三节 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162

- 一、对五四新思潮的非理性批判 163
- 二、探本求源融汇古今中西的新文化观 166
- 三、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互动关系 169

第四节 梁启超科学观的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 174

- 一、重科学精神轻科学结果的科学价值论 175
- 二、以人文自觉反对科学主义误导的“科学
破产”论 179
- 三、维护科学反对保守的科学实践论 182

第四章 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与人物 187

第一节 朱谦之哲学思想管窥 188

- 一、扫荡一切的虚无哲学 189

二、高扬生命情调的唯情哲学 192

三、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 195

第二节 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张申府 200

一、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 201

二、中国罗素哲学专家 203

三、中西互补的新哲学论 207

第五章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胡适 215

第一节 胡适中西文化观的历史考察与哲学反思 216

一、留美归国前理智与感情的冲突 216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 220

三、20年代后期开路先锋和纯学者的矛盾 224

四、30年代的文化反省与文化重构 227

五、晚年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 229

第二节 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胡适 234

一、开创新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翻译 234

二、意义转型：凸显翻译文学的文化意义和
思想意义 237

三、翻译实绩：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支持和
推动 241

第三节 “祖孙法”视野下的胡适学术研究方法论 245

一、胡适治学方法论概述 245

二、胡适方法论探源——“祖”的方法 250

三、胡适方法论的影响——“孙”的方法 253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70

第一章

五四运动研究与五四精神传承

本章内容提要：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从国共两党历年纪念五四运动的维度观察不难发现，五四具有复杂性、歧向性和时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五四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肯定五四历史性功勋的同时，必须看到五四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返回五四现场，是避免五四研究中“意识形态污染”的重要方法。早在五四期间，时人对五四的缺点便进行了即时的批评、辩护和反思，这些文字材料极具价值，有利于我们呈现多面相的五四场景，有利于我们突破后毛泽东时代凝定的五四话语体系，解构五四寓言和五四神话。20世纪30年代末期，陈伯达、艾思奇、张申府、胡绳等党内外学者致力于推行新启蒙运动，他们在肯定五四思想启蒙的时代价值的同时，紧密结合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指出五四存在着激进反传统、全盘西化，以及思想粗浅、浮躁、非理性等缺陷，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等口号，在中西马的融合创新中凸显文化建设的民族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五四精神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而创造是五四精神的实质。当代青年应该成为五四创造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始终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五四青年承担了那个时代的重任，走在时代前列并引领时代发展。当代青年也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了创新创造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第一节 五四运动研究三题

——从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谈起

五四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越说越有味的话题。90多年来,学界和政界赋予五四太多的东西,以至于有“不堪重负的五四”之叹。五四几乎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共产党对五四情有独钟,国民党对五四亦非无动于衷。事实上,除特殊年份和特殊时期外,国共两党每年5月4日前后,均举行不同规模 and 不同性质的五四纪念活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也对纪念五四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客观地说,五四研究还有不成熟之处,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如五四运动究竟是由谁发动和领导的?独断的五四诠释是否强化或模糊了五四历史真相?五四遗产在不同的时代是否具有不同的价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有着怎样的地位和影响?……在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澄清。

一、复杂性:关于五四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90多年来,人们对五四运动究竟由谁领导和发动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仅国共两党因争夺政治资源,论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先进性,争夺五四领导权而大打口水战^①,即便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远未达成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当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曾多次对五四运动做出评价,肯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

^① 本节所谓“国共两党”主要是指国共两党政治领袖及具有国共两党政治身份的学者。

位,指出运动存在的不足。关于五四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一文中做了如下的分析:“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①两年后他又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②毛泽东虽然特别提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并没有说这些知识分子究竟在运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没有具体论及是否只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反传统倡西学的新潮人士是否归属进步的知识分子范畴。事实上,如果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来分析,毛泽东并不曾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也从来就不曾明确说过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后来具有共产党背景的作者往往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断言在五四运动的大联合中,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③这样一来,就把蔡元培、胡适、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这些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晚年在论及五四运动时曾指出: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④

很显然,这是单就负五四思想言论责任者而言的。若考虑到五四爱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

② 同①,第403页。

③ 华岗:《五四运动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60页;彭明:《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70页。

④ 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5页。

国救亡运动,则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学生运动领袖就不能不提及了。

国民党显然不同意共产党关于五四领导权的官方说法,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得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一结论是不合情理的。国民党理论家叶楚伦认为,五四时期最有实力的党派是中国国民党,五四运动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领导的。^① 1942年5月《世界学生》杂志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就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例如吴稚晖、王星拱等撰文,通过重塑五四的形象,突出孙中山、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作用,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②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将五四健将罗家伦推为五四运动的官方发言人。罗家伦多次利用五四纪念日发表演说,指出共产党领导五四运动之谬,认为领导五四运动的人是孙中山和蔡元培。对于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文人强化国民党与五四运动联系的做法,自由主义者胡适表示了十足的反感,他晚年定居台北时表示:

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③

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由谁发动和领导的呢?我们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必然,它由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其中尤以进步知识分子作用为大,很难说是共产党、国民党或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领导了五四运动,运动

① 叶楚伦:《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资料特辑》,台湾时代出版社,1947年,第13页。

②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③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260页。

初期带有明显的自发性质。^①就前期新文化运动而言,主要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分子领导和发动的;1919年的爱国政治运动因受到巴黎和会出让中国权益给日本的刺激而爆发,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运动的主要骨干,受俄国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以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成员也参与其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阵营发生分化,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五四运动的性质遂发生改变。五四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无力驾驭五四运动的方向,保守的国民党逐渐背叛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胡适对《新青年》杂志布尔什维克化的忧虑及20世纪20年代末炮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几篇文章,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上述判断。

国共两党关于五四领导权的歧见,曾长期支配着海峡两岸史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评判,使得五四研究的多元化局面迟迟不能出现,并因此限制了五四研究的深入。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党派意气较重,那么,现在是到了摒弃党派之见,回归历史真实的时候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学术界出现了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国共两党对一些敏感的提法也渐趋谨慎。在此背景下,关于五四领导权认识的党派偏执已明显减弱,例如在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②我们认为,这是各方都能接受且符合实际的一个判断。

二、歧向性:关于五四诠释的模式问题

毫无疑问,五四研究乃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五四运动不仅

^① 董德福、史云波:《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6-110页。

^② 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人民日报》,1999年5月4日。

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是各种力量合力推动的一场运动,这就决定了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五四诠释的多元性。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激进反传统运动,由于时间仓促,破坏多于建设,自然遭到有传统情结的人的诅咒和非议,这些人认为它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同时,新文化的后进也不满足于它,认为它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冲动;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和文艺复兴的人士不免要对它提出批评,认为政治运动是对思想文化运动不幸的干扰,学生牺牲学业干预政治是最不经济的事;后期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色彩愈发浓烈,引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民党以及传统主义者的不满和恐惧;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政党、政治集团日后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不同的党派对它有不同诠释和评价。正是由于五四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研究、回忆和反思也呈现出歧向性特征,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不同的五四话语系统。

最早对五四运动的异质性阐释进行梳理的是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他在《五四运动》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与评价。他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难,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样三个系统来展开论述。^①这一类型划分法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导向性影响。例如洪晓楠认为,从总体上说,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即:唯物史观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四革命的强势话语系统,自由主义西化派有关五四启蒙的渐进的弱势话语系统,文化保守主义派构建的反五四话语系统。^②对胡适研究卓有成绩的欧阳哲生在他的论著中,集中讨论了自由主义视野下的

①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7-486页。

② 洪晓楠:《文化哲学思潮简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5-71页。

五四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五四运动、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等几个问题,并对激进的五四革命话语系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揭示。^①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认为有三个“五四”:第一个“五四”是毛泽东把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个“五四”观只是抽取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而舍去了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第二个“五四”是从右的方面作为中国革命潜在前提的轨迹,这就是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道路的人士的轨迹。第三个“五四”是指梁漱溟的轨迹,这是不同于陈、李,也不同于胡的“‘另一个’中国革命的轨迹”。^② 自周策纵以来的五四诠释模式说,是对各式各样五四阐释的高度概括和归纳,为我们反思五四运动研究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毋庸讳言,这样一种粗线条的五四话语归纳忽略了五四评说的复杂性,难免挂一漏万。例如国民党赞扬五四爱国运动但痛恨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就是不同于上述三种五四诠释模式或三个“五四”的另一种五四解读;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话语系统内也非铁板一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有很大分歧,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五四文本的解读也会前后判若两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对五四意义的阐发也各有侧重,或强调其爱国救亡的民族主义精神,或凸显其思想启蒙意义,难以用一个固定的诠释框架来套用。

在西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大致同时出现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由于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不同,因而产生了这种一分为三的思想格局,至今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在中国,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明显地产生

① 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4-210页。

② [日]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12月,第306-315页。

生了类似的思想分野,在欧洲长达两个世纪的三种不同的思想路径和价值取向,被同时纳入五四时期仅仅十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中,使得五四运动的内涵变得异常复杂、诡异。不同立场的人受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情感反应的影响,对五四运动的内容取舍及其意义的评价各不相同,他们对五四话语的重构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思想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时,都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思想争辩交织在一起。美国学者舒衡哲通过对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和观察,得出了带有规律性意味的结论: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为浮现出什么样的被修正的“五四”形象而进行的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政治战争而展开。革命进程的曲折和转向反映在杰出政治领袖精心制作的、变化着的对“五四”的解释中。这些领袖要从过去抽取出有用的东西,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不得不对“五四”进行解释。

杰出的政治领袖人物如此,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也不例外。^①舒衡哲对五四回忆史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独到的研究视角和翔实的史料,为他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提供了支撑。

正是因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各政治团体往往利用研究或纪念五四的机会,选取五四运动对自己有用的资源,以加强对自己存在合法性的佐证。但五四是一个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任何一种解释模式都难免有所见而又有所蔽,都只是揭示了其中的一个面相,而忽视了其他的面相。由于不同的诠释模式之间缺少理性的对话机制,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因而我们很难形成一个关于五四真相的完整印象。我们认为,五四诠释可以而且理应提倡个性化色彩,但个性化不能以

^① [美]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1-153页。